

人、岁月、生活

第三部

爱伦堡著

秦順新 馮南江譯



人、岁 月、生 活

第 三 部

〔苏联〕爱 倫 堡 著

秦 順 新 馮 南 江 譯

（供 內 部 參 考）

人、岁月、生活(第三部) *

书号 1690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18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5}{8}$ 插页 2

196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4) 0.86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一九二一年晚秋，我离开了无忧无虑的布鲁塞尔，来到了柏林。德国人的生活就像在火车站上一样，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报童们喊着：“柏林日报！最新消息！最新消息！萨克森发生了共产党暴动！慕尼黑有人进行阴谋活动！”人们一面默默地读着报纸，一面走去上班。商店老板每天都要更换货物价格的卡片；马克在不断地贬值。在庫尔福尔斯特大街上，走着一群群的外国人，他们用低价收购古董。穷人住宅区的几个面包房被捣毁。看样子，一切都要崩溃瓦解，但是工厂的烟囱在冒烟，银行职员规矩地写着大数目的数字，妓女拼命地往脸上涂脂抹粉，新闻记者报导俄罗斯的饥饉或魯登道夫^①的高尚胸怀，小学生背诵着帝国往昔的辉煌业绩。到处都可以看见小型舞厅，一对对瘦弱的舞伴在机械地摇晃着身子。爵士音乐震耳欲聋。我记得当时的两只流行歌曲：《你喜欢香蕉嗎？》和《我的黑皮肤的苏尼雅》。在

① 魯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將軍，法西斯总体战理論的創造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任德軍參謀長。

一个舞厅里，哑哑的男高音歌手凄惨地唱着：“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然而，世界末日却迟迟未来。

凱勒曼^①发表了描写德国革命的长篇小说《十一月九日》。我不知道，这个日子是否能告诉年轻读者一些什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德皇匆匆地逃往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宣布成立共和国。然而，在政府的各部里，却坐着过去的高官显贵，守門人毕恭毕敬地问候道：“您好，三級文官老爷。”我住在布拉格广场的一个小旅馆中，旁边就是寬闊的凱撒林蔭道；我在城內蹣了一遭，参观了巨大的霍亨索倫广场。小旅馆的房間里，威廉的像片依然高挂在墙上。

我認識了詩人卡尔·爱因斯坦。这是个快活的浪漫主义者，生着一个光秃秃的大脑袋，有个小瘤子点缀其上。他对我說他曾在西綫当过兵，患了精神失常症。他对黑人雕刻的爱好，他那些衰瀆神圣的詩以及那种已經成为过去时代的烟云的交織着失望与希望的混合情緒，使我回想起自己旧日的朋友們——“洛东达”的老顾客。卡尔·爱因斯坦写了一个关于耶穌的剧本，因此被控犯了瀆神罪。我出席了法庭。审判是在一間半明半暗的大厅里进行的。通常，宗教狂热症的概念是和天主教、羅馬教皇的訓諭以及宗教裁判所連在一起的。但是燒死塞維

① 凱勒曼(1879—1951)，德國反法西斯主義的作家。

特医生的不是天主教徒，而是天主教徒視之为自由思想者的喀尔文教徒，他被判处火刑是因为沒有能将生物体的机能和上帝联系起来。在卡尔·爱因斯坦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院鉴定人引证了二十世紀許多文明的神学家的著作。

（一九四五年，我看見了飽經战火的柏林。曾經在其中审讯过卡尔·爱因斯坦的那座建筑物，只留下了一段殘壁，上面有俄罗斯工兵写的几个字：此处地雷已清除。）

在一九二一年，柏林的所有东西都留給人一种幻觉。房屋正面胸脯丰满的瓦尔基利亚女神像毫无表情地耸立着。电梯繼續在开动，但室内却是一片寒冷和飢餓。电車售票員殷勤地扶着三級文官夫人下車；电車的路綫也还像过去一样，但是沒有人知道历史的路綫。災难佯装成幸福。使我吃惊的是陈列在商店櫥窗內的許多玫瑰色和天藍色的护胸衣，它們是用来代替价錢昂貴的衬衣的，护胸衣本身就是一种招牌，即使它不能說明生活的幸福，也可以权充体面的证据。在我有时光顾的“約斯蒂”咖啡馆中，一种名为“莫可”的劣等飲料是盛在金屬咖啡壺中，壺把上还套了个小手套，以免烫伤顾客的指头。点心是用冻土豆做的。柏林人还像过去一样吸着雪茄烟，他們說，这些烟是“哈瓦那雪茄”或“巴西雪茄”，其实这不过是用尼古丁泡制的白菜叶做的罢了。說得动听一些，一切都

像帝国时代那样，有条不紊。

一天晚上，我和刚从莫斯科来的弗·盖·李定一起出外散步。咖啡馆很早上门：“宵禁”是战争年代的残余。有个人走到我们跟前，建议我们去一个夜间营业的咖啡馆。我们坐上了地下电车，随后又在昏暗的街道上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一座满不错的住宅的门口。室内的墙壁上挂着一些穿军服的家人的照片和一幅表现日落景色的图画。主人给我们端来了香槟酒——檸檬水和酒精的混合物。过了不一会，主人的两个小姑娘来了，她们没有穿衣服，给我们表演了几出舞蹈。其中一个和弗拉季米尔·盖尔曼诺维奇攀谈起来，她说她很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母亲用满怀期望的目光望着外国客人，也许，他们会喜欢自己女儿的，并且用美元付钞，如果付的是马克那就太糟了，明天早晨它又会贬值。这位可敬的妈妈叹了口气说：“这难道是生活吗？这是世界末日啊……”

我来到柏林前不久，一群疯狂的民族主义分子杀害了首都党的领导人之一爱尔茨贝格。“俾斯麦帝制协会”的拥护者毫不知耻地称赞这次杀人行为。法律家装出了在研究法律条文的样子，社会民主党人腼腆地叹了口气，然而，未来的党卫军分子却在练习活靶射击。

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把灾难当成天经地义的、秩序井然的生活。残废者尽量不使自己的假腿发出响声，没

有胳膊的空袖筒也用別針卡住。面部被火药燒伤的人戴上了大墨鏡。在首都街道上，失敗的战争也沒有忘記使用迷彩。

報紙上說，送入育嬰堂的嬰兒，百分之三十在最初几天內死亡。（那些僥幸活下來的，也成了一九四一年的新兵和希特勒的炮灰……）

“烏發”影片公司正在匆忙地拍摄影片；除了不描寫剛剛結束的战争以外，影片的題材可說是五花八門、無所不有了。然而，觀眾需要的却是痛苦的裝模作樣、瘋狂的暴行和悲慘的結局。我偶爾參觀了一次這類電影的拍攝。父親企圖把女主角藏起來，情夫用鞭子打她，逼得她從七層樓上跳下去，男主角隨後也上吊自殺了。導演對我說，為了適應出口的要求，他們還要給影片拍攝另一個幸福的結局。我多次看見，那些面色蒼白、身體孱弱的少年們是在怎樣興高采烈地欣賞着銀幕上一群耗子吃一個人或者一條毒蛇咬傷了一個美人的鏡頭。

我參觀了“突擊”派的畫展；我面前的不是油畫，也不是水彩畫，而是一些用畫筆和顏料代替槍炮和炸彈的人的歇斯底里的發作。我在自己筆記本中記下了幾幅畫的名字：《血的交響樂》、《無線電的混亂》、《世界末日的色調》。精神上的郁悶要求發泄，甚至批評家們稱之為“新表現派”或“達達派”的東西，也不像我們習慣中所指的艺术作品，而是同松姆河大會戰的回憶、同暴動和叛亂、同

貼身穿的護胸衣有着更密切的聯繫。“突擊”派畫展的發起人韋爾登有着一副尖削的面孔和長長的頭髮。他喜歡談戀生子、直覺和文明的沒落。他在草草布置的画廊里就像在舒適的新居中一樣，感到特別自在；他用鄰近一個咖啡館送來的咖啡和奶油蛋糕款待了我。

我來到了馬格德堡；房屋的正面、電車、售報亭都慷慨地蒙上了一種歇斯底里的色彩。領導市政建設總局的是一位天才的建築師布魯諾·塔烏特。科爾布捷^①是從幾何學獲得靈感的。是啊，他住在法國……然而布魯諾·塔烏特卻生活在一個動亂的國家里，這兒有飢餓和投機，有昨天對巴格達的幻想和明日對印度的遠征，有“啤酒館的叛亂”和工人的暴動。（希特勒掌權後，布魯諾·塔烏特逃到了日本，他很高興自己能在那兒看見現代化的建築——傳統的日本房子是明亮而寬敞的。）

我清晰地記得擺在莫斯科街頭的至上主義派的繪畫，但馬格德堡的見聞卻使我異常驚訝。塔特林、馬列維奇、波波娃、羅得謙科的語言無論是怎样生僻，有時甚至枯燥，然而終歸是藝術的語言。在德國的繪畫中，那矯揉造作的風氣和缺乏分寸感使我感到壓抑，我覺得畫在啼哭。

我記得哈森克萊維爾^②的詩集的封面：一個滿臉失

① 勒·科爾布捷(1887年生)，法國著名建築師。

② 哈森克萊維爾(1890—1940)，德國表現派作家，后期作品中有反法西斯的情緒。

望神情的人在叫喊。当时的詩歌里充滿着五花八門的預言；魏尔菲勒^①和溫魯都在預言世界的毀灭。然而，对詩歌抱着淡漠态度的街道上的行人却沉默不語。

我遇見了列昂哈尔德·弗兰克^②。这时他已經四十岁了，成了有名望的作家，但仍然像个滿腦子尽是幻想的年輕人，他以为只要人們彼此看上一眼，微笑一下，那种仇恨的誤解立刻就会消失。而且他后来也很少变化；無論什么东西也不能使他变得冷酷无情。我在法西斯占领巴黎的时期见过他，战后他住在西德，当他来到柏林时，曾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作家們进行过友好的談話。他的一本书的名字叫《人是善良的》，这是非常主观的評價——弗兰克知道什么是党卫軍，不过他本人倒是个真正善良的人。

阿尔图尔·霍里切尔搖晃着他那灰色的鬚发說：“你瞧吧，不出一年，柏林的工人准会向莫斯科伸出手去……”

在外国商人和新式富翁（人們称呼他們“席別尔”）居住的地区，有一个“洛馬尼謝斯咖啡館”，这儿是作家、画家、小投机商和妓女的聚集地。这儿也可以碰見躲避墨索里尼的蓖麻油^③的意大利人和逃出霍尔蒂的監獄的匈

① 魏尔菲勒(1890—1945)，奥地利表現派作家。

② 弗兰克(1882年生)，当代德国作家。

③ 墨索里尼对被逮捕的人常常采用灌蓖麻油这种刑罰。

牙利人。在这儿，匈牙利画家莫果利·纳吉同李席茨基就构成主义进行争论；马雅可夫斯基向皮斯卡托介绍梅耶尔霍尔德的戏剧；意大利的幻想家幻想着工人对罗马进行国际性的远征；然而，机灵的人却在搞小面额外币的投机生意。每逢礼拜日，举止端庄的市民都去赫德特尼斯教堂做礼拜，他们总要对“洛马尼谢斯咖啡馆”怯生生地望一眼，仿佛教堂的对面就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西柏林在当时也不愧是“西方的”，这不仅和历史的风云，而且也与自然界的风向有关：在柏林、伦敦和巴黎，有钱人都选中了西部地区，因为风通常是从大西洋吹来的，工厂普遍设在东部郊区。

西柏林的人仰望着西方，但同时也憎恨西方：防御共产主义的愿望和复仇的愿望交织在一起。在一些商店的橱窗中可以看见这样的话：“此处不卖法国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席别尔的妻子们根本用不着顾虑能否买到赫尔林香水：爱国主义是会在发财致富的欲望面前让步的。但是莫斯科的卡梅尔剧院在来柏林作巡回演出时，却不得不把法国小歌剧《日洛夫里一日洛夫里亚》^①改为《孿生子》，把《亚德琳娜·列库略尔》改为《萨克逊的王子》。

在东柏林和北柏林有时可以听见唱《国际歌》的声

^① 法国作曲家列考克(1832—1918)的作品。

音。那儿既沒有人买卖外币，也沒有人因皇帝的出走而啼哭。那儿的人們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一面工作，一面在等待着革命的爆发。他們很有耐心地等待着，也許太有耐心了……我看見過几次游行。人們摆出一副阴沉的面孔从大街上列队走过，不时地举一举拳头。但是游行必定要在两点钟結束，因为这是吃午飯的时间。我記得自己同一个工人談話的情形。他企图向我证明，工会會員數目的增加就意味着无产階級的胜利。对組織的热爱，是一种高貴的情感；然而在德国，这显得太过份了些。（一九四〇年，我看見了沒有汽車的柏林，柏林的汽車正在欧洲的公路上疾馳；第三帝国正在进行征服世界的事業。然而，街上的行人一見紅灯立刻木然不动，誰也不敢穿越街心。）我的交談者在一九二二年全神貫注在初級数学上。而外面已經是列宁和爱因斯坦的时代了……

在亚历山大廣場上的一个啤酒館里，我第一次听到希特勒这个名字。一个顧客热情地談論着巴伐利亞人；瞧，这才是真正的好汉！他們馬上就要出动了。这些都是自己人，是工人和真正的德国人。他們要让所有的人——法国人、犹太人、席别尔、俄罗斯人都受自己的支配。邻座有人表示反对，但是希特勒的拥护者却固执地反复說：“我是以一个德国人和工人的身份說这話的……”

馬克繼續在貶值；我来的时候，報紙只卖一个馬克；后来，买一份報紙就得付三十馬克。一条新的地下铁道

建成了。“小型舞場”里，一对对的情人拼死命地蹦跳着，仿佛在执行一项艰巨任务似的。劳合·乔治^①宣布說，德国必須分文不差地拿出全部賠款。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死亡率不断上升。大家都在談論斯梯涅斯和斯平格勒。斯梯涅斯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人物；他是新的帝王，是魯尔的統治者，是新的奥林普山上的赫菲斯特。讀过斯平格勒的著作的人不多；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一本书的名字：《西方世界的末日》（俄譯名为《欧洲的末日》），他在这本书中痛悼了他所熟悉的文化的毀灭。肆无忌惮的投机商、杀人凶手、凶恶的記者都在援引斯平格勒的話：既然死亡的时刻已經来临，又何必客气呢？甚至“西方末日”牌的香水也在市場上出現了。

罢工的風潮时有爆发。有一次在“約斯蒂”咖啡館里面，一个穿戴考究的人突然倒在地上。邻桌上的一位医生在診斷之后高声說：“給他一些真正的咖啡吧……这是长期营养不良引起的虛脱……”生活越来越困难，但是人們却繼續認真而努力地工作着。

在拥挤不堪的电車里，有人罵我是“波兰狗”。在考究的資產階級住宅的正門旁边的牆上，挂着一个牌子：“专供老爷出入之門”，就在这面牆上我看見有人用粉笔画了这样几个字：“杀死犹太人！”

①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反动政客，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

价格、謾罵声和失望都是无比的龐大。

《行动》杂志的詩人們写道，实行新經濟政策之后，他們再也不相信俄罗斯了，德国人将要向世界表明，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一个詩人說，“首先应当在各个国家里同时杀掉一千万人，这是最低数字……”（赫尔岑曾著文評論过“德国革命的梭巴开維支”海因岑^①，后者幻想道：“只要从地球上消灭掉二百万人，革命事业就会一帆风顺的。”）《紅旗报》的一个撰稿人对我說：“你的《胡列尼托》是一本不成体統的书！我不懂它怎么能够在莫斯科出版。如果我們掌握了政权，我們是不会要这种书的……”

当时的总理是魏尔特。他打算拯救德意志共和国，所以在拉帕罗同苏維埃俄罗斯签订了協議。英国人和法国人对此大为不滿。至于德国人民，他們繼續在等待着，一部分人在等待革命，另一部分人則等待着法西斯的暴动。一九五二年，我在維也納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遇見了魏尔特总理。这时他七十五岁了。在一次拖得很长的會議之后，我們进行了交談。魏尔特說：“作家在写完一部长篇小說时，定会有一种滿足的感觉——即使这部作品的篇幅只有薄薄的数十頁。一个政治家的晚年却是另一回事；对他來說，重要的不是个别的成就，而是結局。我可以說，我的一生是被一笔勾消了。起初來了希特勒。我

① 海因岑(1809—1880)，德国共和主义者，政論家，巴登起义的参加者；梭巴开維支是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人物。

知道，战争将要爆发。我不得不到国外去。战争结束了，又来了阿登纳。我们在一个党内，他比我大三岁。我对他说，他在重复自己前任的错误。他是个聪明人，但却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不愿活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难道在你们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吗？这个，请原谅，是幼稚的行为。”（他闭上了自己那双呆滞而疲惫的眼睛……）

夏季的一天里，“康苏尔”组织中的一个法西斯分子在格魯涅瓦尔德大街上刺杀了外交部长拉頓諾。当警察查出了凶手们的线索后，他们全体自杀了。法西斯分子的葬礼是按照军队仪式举行的。

店主们来不及改变货物的价格；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价格的基数不变，只增加其系数。昨天系数是四百，今天就成了六百。郊区影院的银幕上总是那个癫狂的卡利加里医生。柏林在一天内要发生九次自杀案件。一种专门研究同性恋爱的理论与实践的杂志《友谊》开始出版了。

德国在那几年里发现了自己的肖像画家——赫奥尔格·格罗斯。他笔下的席别尔的手指头很像一根根小灌肠。他所画的过去和未来的战争的英雄们，都是一些佩戴铁十字勋章的仇恨人类的家伙。批评家说他是表现派；其实他的画是冷酷的现实主义和预见的结合，不知为什么人们把这种预见叫作幻想。是的，他敢于描绘赤身

露体坐在办公桌旁边的三級文官，描繪正在掏尸体內臟的穿得花枝招展的胖太太以及冲洗血淋淋双手的凶手。在一九二二年，这看来只是一种离奇的想像，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了。格罗斯的繪画的严峻是富有詩意的，它們和希尔得斯汉市的木刻丽达神像、哥特字母的印刷体格言、市政局下面的酒館和堆在狹窄的中世紀街道上的酒麵的气味具有相同的性质。

格罗斯生着一对孩子般的明亮的眸子，臉上时常流露着羞澀的微笑。他是个溫和、善良的人，憎恨暴虐，幻想着人类的幸福；也許，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毫不留情地画出了未来的党卫軍、战利品的爱好者、奥斯威辛的砌炉工得以滋生的溫床。

当时，全世界都在注視着柏林。一些人感到不安，另一些人抱着希望：欧洲未来数十年的命运将要在这座城市里得到决定。这里的一切——房屋、風俗、道德以及对数字、螺釘和图表的信仰对我都是陌生的。虽然如此，我那时写道：“我用那么多不吸引人的描写来补充我对柏林的評述，大概会使你觉得你沒有住在柏林是一种幸福……我請求你相信我对你說的話，爱柏林吧，这是个有着令人生厌的紀念碑和不安的眼睛的城市。”我怀着不安与希望在这个城市里度过了两年的岁月；我觉得，我是生活在前綫上，只是炮火沉寂的短暫時刻拖长了。但是我也常常問自己：我在等待什么？我希望相信，但是又不能

相信……

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初次来到柏林后，便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德意志，今天我在你的土地上漫步，我对你的爱情较前更加深厚。”有时诗人看见的东西正是批评家所没有看见的，于是诗人就遭到责备，说他错了。有时诗人和其他人一起错了，于是批评家就像善良的主考人一样，赞同地点点头。馬雅可夫斯基说到德国时，他重复了一九二二年千百万人心中所想的那些话。不错，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遇害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是，汉堡起义的火光却要在未来的天空中出现。对于当代人来说，一切尚未定局，一九二二年秋天，我和其他人一起在等待着革命。

不应当说德国人是温和的和守中庸之道的。不仅表现派的艺术，德国的历史书籍对此也渲染得太过分了。

馬雅可夫斯基写道，赢得胜利的德国工人将要“穿过布兰登堡大门的威廉拱门”。然而历史作出了另外的决定：十一年后，穿过这些大门的是疯狂的希特勒分子；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是苏联士兵……

2

我不知道那几年里柏林有多少俄国人；大概一定很